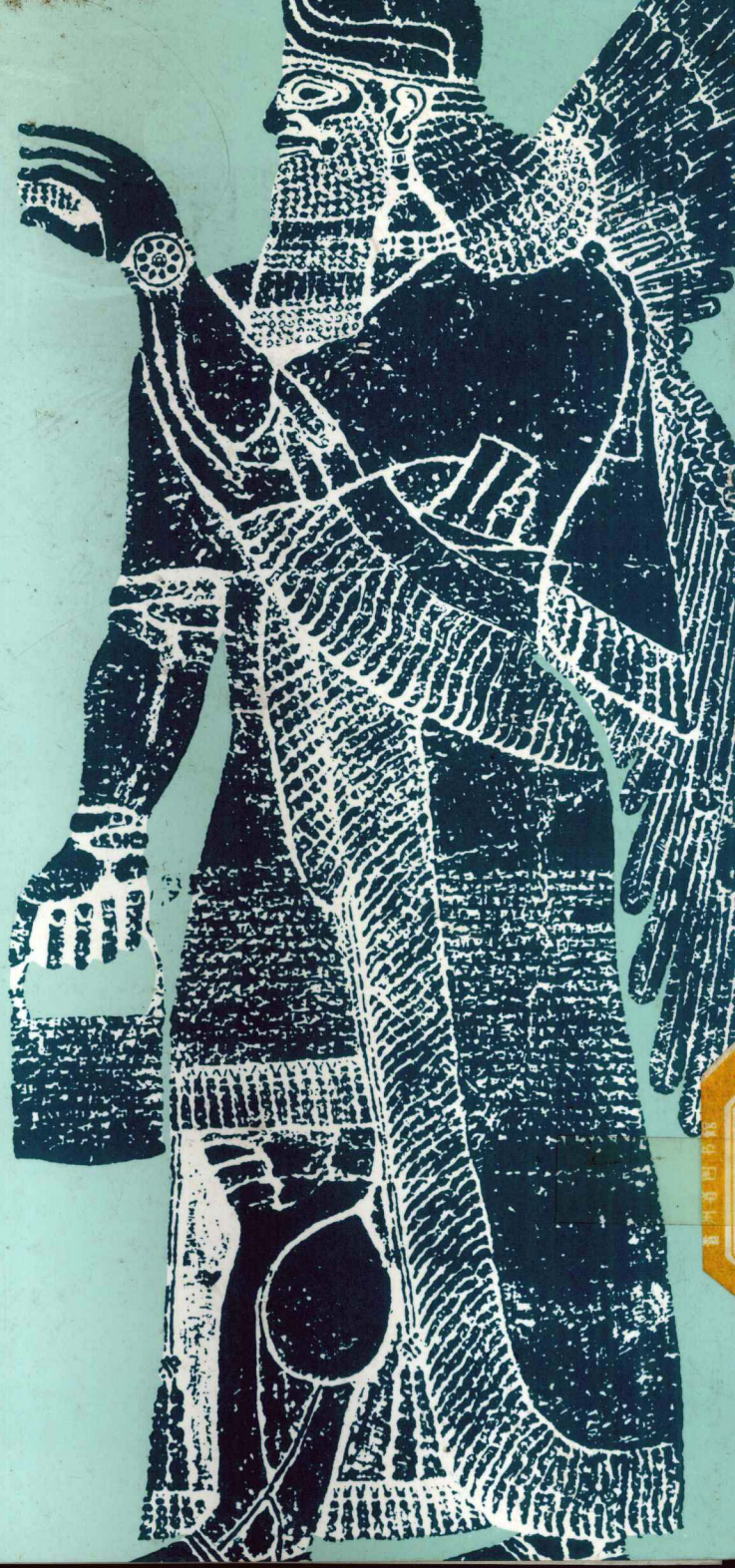


歐洲史新論

劉景輝譯

臺灣學
書局印行



劉景輝譯

大學
用書

歐洲史新論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歐洲史新論／劉景輝譯．--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
民66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15-0496-3 (精裝)．--ISBN 957-15
-0497-1 (平裝)

1 歐洲-歷史

740

82000914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初版第五次印刷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初版	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五〇元 平裝新臺幣一九〇元	地址：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 字樓及七字樓 電話：七九五九五五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永和成功路一段四十五號 電話：九二八七一四	印刷所：淵明印刷廠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三六三三三三 FAX：三六三三三三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三六三三三三 FAX：三六三三三三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文生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譯者：劉景輝	大學 用書 歐洲史新論 全一冊
--------------------	--------------	------------------------------	--	--------------	-----------------------------	-----------	--------------------------	---	--	------------	---------	------------	--------	-----------------------

74004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496-3 (精裝)
ISBN 957-15-0497-1 (平裝)

前 言

麥克尼爾的「歐洲史新論」這本書，中文譯稿不過祇有少的十二萬餘字，卻花了我兩年（一九七四夏至一九七六夏）不少的業餘時間才譯完。麥克尼爾的這本書，主要是分析性，說理性，與比較性的，所以，我很希望譯文能將他的觀念交待清楚，因此，大體上，我是用意譯的方式來處理。

雖然，我十分喜歡他這本書，我卻對這本書第一章原文的組織並不十分滿意，我在翻譯第一章的時候，將第一章的原文重行組合，並刪節若干意思重複之處。熱心的讀者，如將我的第一章譯文去覆案作者的原文，會發現譯文與原文的組織之間，有着若干距離。這是我首先要請讀者諒察的。縱然譯文組織與原文組織之間有着若干距離，我敢說，譯文並沒有扭曲原文的意思。

「歐洲史新論」原書的目錄，祇分成五章，每章之下，沒有小節的名目。這本書在排印的時候，學生書局的主事先生發現了這個問題，以為不易由目錄中獲知內容的梗概，建議我將每章的內容細分一下，以便讀者閱讀，這真是一項有價值的建議。我花了一點時間，為各章作分目的工作。現在中文目錄中各小節名稱全是我擬的。我不敢說，這些小節的名稱能恰如其份的顯示各小節所包含的意義，但是，我相信這些小題目對於讀者去翻讀本書的確是

有幫助的。我感謝學生書局主事先生的建議。

乘着「歐洲史新論」出版的機會，我將我過去所譯的，並且發表過的兩篇譯文收入本書作爲本書的附錄。一篇是布林頓所著的「歐洲學術史」；一篇是考古家「許萊門自傳」。布林頓的「歐洲學術史」，主要討論有關歐洲學術史的各家著作，譯文曾發表在「食貨月刊」復刊第四卷第十期上（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許萊門自傳」說明傳主如何立志去發掘古城特洛；譯文曾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四日）它們之能發表，我要感謝兩刊主編先生的優容。這兩篇文章，我認爲與歐洲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收入本書供讀者諸君參考。

「歐洲史新論」的第二章，是不容易讀的，因爲它是理論的探討，我要像作者麥克尼爾教授一樣，特別提醒讀者，凡是對理論缺乏興趣的讀者，不妨跳過此章逕讀第三章。

劉景輝 謹識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

「歐洲史新論」譯者序

論歷史教育的時代意義

由「西方的興起」談起

劉景輝

美國名史學家芝加哥大學麥克尼爾教授 (Prof. William H. McNeill) 的著作，由美國出版公司授權在臺灣翻印的，據我所知，有三部：一是榮獲一九六四年美國「國家著作獎」(National Book Award) 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這是麥克尼爾的成名作。一是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世界通史」(A World History)，臺灣翻印的是一九七一年修訂的第二版。另一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西洋文明史大綱」(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

寫「歷史的研究」的大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在評介「西方的興起」一書

時說：「西方的興起一書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史著作中敘述最透澈的一本，雖然這部書着重西方在近代的發展，但是，它也說明了文明在肥沃月灣興起之後，向西向東擴張的全部過程，我確信我們讀完這本書之後，對於形成我們今天世界的漫長與複雜的歷史過程，一定會有清楚的了解。」湯恩比對「西方的興起」一書的評介，決非信口開河，隨便說說而已。

在臺灣喜歡研讀西洋史學名著的朋友，很多都讀過「西方的興起」這部書。我相信凡是讀過麥克尼爾這部著作的朋友，一定會嘆服麥克尼爾資料搜集之豐富，組織之高明，與創作力之卓越。我個人就十分欣賞他這部書。他這部書最大的貢獻，表現在他的創作力上，換言之，表現在史識上。在史識上，他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重視：一，他對整個西方歷史的發展，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來解釋。二，他在通史性的著作中，建立了一套新的分期制，來說明人類歷史的發展，打破了已往一般通史著述的分期制。同樣的理論，同樣的分期制也分別應用在他的「世界通史」與「西洋文明史大綱」二書中。

「西方的興起」一書代表麥克尼爾對西方歷史發展沉思與觀察的結晶。從他的書名可知，他的整個觀念顯然是與德國大史學家與哲學家史賓格勒 (Spengler) 的「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背道而馳。事實上，亦的確如此。

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他的德文本先後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二年出版。英譯本則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八年間相繼出版。「西方的衰落」一書的副標題是「世界史形態大綱」(Outlines of a 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從而可知，「西方的衰落」一書也討論歐洲之外的其他各地的文化。像中國文化、古代墨西哥文

化、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都在論議之列。

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是對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史觀的一種反動。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將所有的歷史視為一種有機演化過程；一種長久，緩慢，而逐漸進步的過程；一種從低級到高級，從貧窮到富裕，從惡劣到美好，從專制到自由等等單線進步的過程。史賓格勒即反對這種單線的進步發展論，他將文化或文明（在這一方面，他始終未將其定義確立）視為有生命之物。因為有生命，於是文化或文明都有出生、茁長、成熟、衰老與死亡的過程。換言之，史賓格勒將歷史解釋成一種生命的循環過程。在這一點上，湯恩比是史賓格勒的同調。此外，史賓格勒認為各文化或文明的生長與死亡的過程都是孤立的，彼此互不相關的。進而，他否認各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性。既然各文化互不相關，又各有其單獨的生長過程，所以對他來說，歷史的發展是可預期的。既然歷史是可預期的，據他的觀察，西方文明的盛期已過，現已走上衰落期，最後終將為東方文明取而代之。「西方的衰落」對西方人而言，充滿着悲觀的論調。

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著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人對西方的科學文明正感困惑之際的悲觀環境中。所以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正反映着當代的悲觀思潮。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西方科學的再評價，在中國激起了民國十二年的「科學與玄學」之戰。胡適之先生是「科學與玄學」之戰的參戰者之一。一九二六年，他在一篇題為「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說：「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

只是一時的病態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餒。」胡適之先生的解析正是對一次大戰時及其後的歐洲思想界的一針見血之論。

說來有趣，麥克尼爾自承他對西方歷史的基本觀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形成了，那時候，他正好二十歲（麥克尼爾出生在一九一七年）。這一年，正逢史賓格勒逝世（史賓格勒生於一八八〇年）。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書的英譯本的全部出版是在一九二八年。英譯本的出版，自是英語世界轟動一時的大事，麥克尼爾很可能在高中時代就讀過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了。史賓格勒之死，言論界與思想界的評論，可能觸發麥克尼爾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問題。從這項思考中，麥克尼爾得出了他對西方文明與史賓格勒迥然相異的看法。這是史賓格勒「西方的衰落」後，繼之還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的道理。

一九四七年，麥克尼爾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後，應聘赴芝加哥大學教書。一九四九年，他出版了「西洋文明史大綱」，而「西方的興起」的基本觀念也隱藏在「西洋文明史大綱」中。「西洋文明史大綱」一書的主要目的，是作為讀「西洋文明史」一科學生的課本。一九五三年，他第二次修訂「西洋文明史大綱」後，次年即着手撰寫「西方的興起」。經過漫長的八年歲月，「西方的興起」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了。在八年的撰寫期間，他先後獲得福特基金會與卡尼基基金會大量的獎助。他說，如果沒有這些慷慨的資助，這本書決不會如此迅速地底於完成。一九六三年，「西方的興起」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出版之後，紙貴洛陽，佳評如潮。一九六四年，「西方的興起」獲得美國國家著作獎，可稱為美國史學界近年來最傑出的通史性著作。

由於「西方的興起」一書的成功，麥克尼爾認為一本簡短的世界史著作，更可以將他對整個人類史的見解，傳達給學生與一般讀者。他說，他的見解無論其缺陷如何，但是在組織性與啓發性方面，它所作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他認為他的見解可以使讀者在讀畢全書後，還有可以加以回味與思考的地方。於是，一九六七年，他寫了「世界通史」一書。「西方的興起」的觀念因此被濃縮到「世界通史」中。對一般讀者而言，「世界通史」的確簡略得多，便於閱讀。麥著「世界通史」已由臺灣兩位女青年學人翻譯完成，年內當可出版問世。中譯本是根據一九七一年「世界通史」的第二版翻譯的。另外，爲了應付大學教育中「西洋文明史」一課，一九六九年，他重新修訂擴大他過去寫的「西洋文明史大綱」，作爲該課的教本。「西洋文明史大綱」與「世界通史」在見解上是一致的，祇不過「西洋文明史大綱」詳於西方省略東方而已。

這部「歐洲史新論」於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出版。在人類史的見解上，它是與「西方的興起」、「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綱」一致的。不同的是，麥克尼爾在這本書用更少的篇幅來表達他對西方文明發展的觀念。而且，在這本書中，他也提出了他個人對歷史、對歷史研究、對歷史教學，以及對文明發展的方向等觀念。「歐洲史新論」可以說是一部言簡意賅的史學著作。爲什麼他在寫了「世界通史」與「西洋文明史大綱」這兩個簡本之後，還寫一本更簡單的書呢？說來很是有趣，請看他在本書序言中的自白，他說：

這一本書有一段不平凡的歷史。一九七二年的春天，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索爾·德克

斯 (Sol Tax,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約我午餐，討論即將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人類學與人類學大會 (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的籌備工作。德克斯教授是大會程序部的負責人。在交談中，他表示了對歐洲人類學家與人類學的研究者，缺乏對歐洲社會的通盤認識一事深感關切。當時，我告訴他我正在籌寫一篇論「歐洲史的形態」(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 的論文。我之所以想寫這樣一篇論文，是因為我不滿於我親炙身受的史學傳統。他要我在論文寫完之後，提送大會。我請他先看一下我的原稿再作決定。

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寫完了這本小書的初稿；並且拿給德克斯教授看。在彼此商議的時候，我們決定祇將最後三章提送大會討論，前兩章省略。全文另外單獨出版，專以歷史家及歷史研究者為對象，因此，第十一屆國際人類學與人類學大會有一天的時間（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專門討論本書後三章的初稿。最後三章的初稿及其在大會上各家的評論都刊印在大會出版的會報上。

現在這個刊印本，已非原稿的本來面目了。它不但經過了作者的自我修正，也加入了大會批評後一些改正，與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同仁的諸多指正。威特比教授 (Joachim Weintrub) 與羅洛克教授 (Peter Novick) 曾不辭辛勞地讀過我的原稿。我的原稿也曾經由芝加哥大學歷史寫作工作室 (Workshop in Historical Writing) 的同仁詳加討論，我是這個工作室的主持者。此外，我的學生對我的原稿也有批評，不過，他們的批評太斯文了，嚴格地講，不能算是批評，但是，他們的意見對我仍然是有助益的。

經過這樣的檢討程序，各位手頭的這本小書，才能倖免於原稿中的一些缺點，因為我借助了他人的學問來改正我的錯誤。雖然如此，有疑問的判斷和分析依然所在多有。有人以為的確切不移之論，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可能是荒唐無稽，有時難免會引起見仁見智之爭。倘若這本小書能夠激起各位讀者去重新思考自己對歐洲史的見解，或者是能使各位讀者重新考慮如何從歷史的觀點來思考問題，那麼這本書的目的就達到了。至於各位讀者是否同意我在本書中的分析與論斷，那就無關緊要。易激動，好議論的讀者總是不表示意見的讀者令作者喜歡，基於這個理由，我將一些批評者認為不完整的或誤人的地方保留下來。我相信這些保留的地方是對通俗的看法的一種小挑戰，這種小挑戰在我看來是勝於四平八穩的持平之論的，四平八穩的持平之論會把我必須要說的新觀點——或是在我看來似乎是新的——埋沒了。

所以，這本小書祇是我的一家之言，而非經典之作。它是教學與研究生活所形成的「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的產品。

在自序中，麥克尼爾說得很明白：「我之所以想寫這樣一篇論文，是因為我不滿意於我親炙身受的史學傳統。」麥克尼爾所謂親炙身受的史學傳統是什麼呢？借用夏志清教授在「克萊娥蒙難」（註一）一文中的詞彙來說，是「磚頭史學」。麥克尼爾認為「磚頭史學」是科學史學的走火入魔。他認為這一類的史學與人們真正的信仰無關，與人們賴以為行事的指導原則無關，與人們批評新經驗無關。他認為這一類的史學著作，過於專門，過於瑣碎，祇有

學術圈內一小羣專家才感到興趣，大多數人對這類煩瑣研究反應冷淡。因此，使普通讀者對於史書的興趣大為降低。可是，這一類的史學卻成爲美國史學的傳統與正宗。麥克尼爾所不滿的即是這種「史學傳統」。其實，對這類史學傳統不滿也不僅麥克尼爾一人。夏志清教授筆下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順 (Jacques Barzun)，亦係反對者與不滿者之一。巴順教授在其所著「克萊娥及其醫師」(Clio and the Doctors)一書中所指責的即是這類史學傳統。巴順教授的中心觀念，請參閱夏志清教授的「克萊娥蒙難」一文。要請讀者注意的是，麥克尼爾的「歐洲史新論」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巴順的「克萊娥及其醫師」是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兩書皆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可見兩大學人對當代的美國史學傳統正具同樣的反感。在中國學人中，不滿於這種史學傳統的人，據我所知，形之於筆墨的，有二位：一位是余英時教授，一位是夏志清教授。余教授的意見表現在「史學，史家，與時代」一文中。該文收入聯經出版社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一書。而夏教授的觀點則表現在「克萊娥蒙難」一文中。夏教授題目中的「克萊娥」是「希臘神話裏主管史詩與史實記載的女神，也就是史學的代名詞。」一九六九年，我翻譯布林頓等三人 (Crane Brinton, John B. Christopher, Robert L. Wolf) 所著的「西洋文化史」時，將「克萊娥」譯成「克麗奧」，似乎記得是從余光中教授譯。可見，對這類史學的不滿，不單限於美國學人了。(我是從血緣與文化背景的觀點而言，將余、夏二教授視爲中國學人)。

科學史學的走火入魔，麥克尼爾認爲，造成了美國歷史教育的衰敗，因爲現在流行的史學已使一般人對歷史不感興趣了。麥克尼爾所謂的歷史教育是指大學中的通史教育，特別是

指歐洲史的通史教育。麥克尼爾爲了說明現代歐洲通史教育的衰敗，他不得不追溯歐洲通史在美國大學中興起的經過與它在大學教育中的黃金時期。我覺得在此處簡單地介紹一下歐洲通史在美國大學中的興起，或許有助於我們對大學課程設計的了解。

在說明歐洲通史在美國大學興起之前，麥克尼爾首先敘述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史觀形成的經過。所謂維多利亞史觀，它的具體內容簡單地說，就是將歐洲歷史的發展看成是一部「自由」的發展或成長史。這種史觀在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形成，故稱之爲維多利亞史觀。這種史觀在二十世紀初期獲得充份地發展。它反映在二十世紀初期出版的「劍橋現代史」中（一九〇一——一一出版），貫串「劍橋現代史」一書的主題就是自由的成長。它反映在美國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中。威爾遜以及一些相信歐洲歷史的發展就是自由的成長的人們，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應該會使世界上自由的領域更加地擴大。

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大學正在邁向現代化大學的途徑上，許多大學添設了歐洲史的課程。但是如何教授歐洲史卻成爲美國教授苦惱的問題。因爲過去從來沒有一部歐洲通史。站在德國人的立場，一部德國史就是一部歐洲史，站在法國人的立場，一部法國史就是一部歐洲史；站在英國人的立場，一部英國史就是一部歐洲史。那麼，在美國教授歐洲史應該是以德國史爲骨幹？還是以法國或英國的歷史爲骨幹呢？這實在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即使是以其中任何一國的歷史爲歐洲史的骨幹，一些其他的國家，不可避免地就成爲某國歷史的陪襯。美國是一個擁有歐洲各個民族的移民所組成的國家，強調某個國家的歷史，顯然都是對其他國家的不公。所以，講授歐洲通史不能以任何歐洲國家的歷史爲主線。在這種情形

下，維多利亞史觀適時出現，維多利亞史觀高舉的自由的成長正是一個適合當時人們的理想的一個崇高的信念，而維多利亞史觀正可以和美國歷史的發展相呼應。於是，自由的成長史很快地就成為歐洲史的主題。被美國大學教授輕易地接受。那時候的人們還有強烈的道德勇氣，他們敢高舉他們所相信的事物。教授歐洲通史的課程名「西洋文明史」(Western Civilization)，在一九二〇年代開始設置，至三〇年代漸次盛行，四〇至五〇年代則大盛。「西洋文明史」一課的主題即是「自由」的成長。列為大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在二〇年代，三〇年代，甚或四〇年代與五〇年代，美國人還的確希望，人們應該以追求自由作為人生最高目標，未來的世界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不單是歐美的人們應該自由，就是全世界的人們也應該自由。他們還有為自由推廣的熱心。

其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許多歐美人士已開始懷疑維多利亞史觀的正確性了。他們認為歐洲歷史的發展並不符合維多利亞史觀。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出現了納粹德國與共產俄國，這兩個國家都是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它們的政治體系都是明顯的反自由傳統的。然而，他們對自由的發展還有高度的信心，認為納粹德國與共產俄國祇不過是歐洲自由成長史上的一股逆流而已，遲早總會消滅的。維多利亞史觀在三〇年代與四〇年代仍然盛行如故。「西洋文明史」一課依然興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納粹德國有一半雖然已歸入自由民主陣營，可是更龐大的東歐地區卻淪入「鐵幕」，成為極權主義的天下。這是對高舉維多利亞史觀者一項嚴重的打擊。可是，維多利亞史觀的餘波仍然盪漾，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冷戰」局面。歐美自由地區人士的信心與恆心是有限的，

在「冷戰」之中，他們已感到獨力難支，他們漸漸拋棄了維多利亞史觀。最明顯的證明是，一九五七至七〇間出版的「新劍橋現代史」一書已無任何貫串全書的主題了。它是一篇篇所謂「科學的史學」的大合唱。維多利亞史觀的拋棄，在美國大學教育上是造成「西洋文明史」的沒落，在美國社會上，形成了「姑息份子」的猖獗。所以，六〇年代以後，美國大學中的「西洋文明史」由必修改為選修，最後列入大學課程當中一種點綴品。我國大學中若干系亦曾有「西洋文化史」之設，近年來亦有「美」化的傾向，不知是否受到美國的影響。由於「姑息份子」的猖獗，極權國家的口號「和平共存」得到了自由世界若干人士的苟同。「姑息份子」猖獗的基本原因，就是他們不相信「自由」會必然擴展，不相信「維多利亞史觀」。這後一點有關「姑息份子」是麥克尼爾原書所無，我補充的。（祇在序文中）。麥克尼爾主要的目的是讓讀者明白「西洋文明史」在大學中沒落的根本原因，我卻是想指出「姑息份子」產生的歷史背景。

麥克尼爾雖認為「維多利亞史觀」不能符合二十世紀歐洲歷史的發展是「西洋文明史」一課衰亡的主要原因，但是歷史學本身沒有盡得應盡的責任也是造成其衰亡的原因之一。麥克尼爾對當代美國史學傳統的批評我們已經在前面看過了。他說，如果史學傳統不改弦易轍，歷史學很有被心理學取代的危險。歷史學者若不力圖振作，寫一些能夠啟發讀者思想的書，教授學生一些行事的原則，他認為歷史學沒落的命運終必難免。他覺得與其喋喋不休地批評舊觀念（維多利亞史觀）的謬誤，不如自己創立一種新的歐洲史理論。他認為這是歷史家應該反省的。而「歐洲史新論」就是他自我反省的成果。於此，我們可以更加地明白，他

寫這一本書固然是表示他對現代美國史學的不滿。同時，他也是爲了振興美國的史學教育。他是想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來代替「維多利亞史觀」，他有更積極的目的。對於他在自序中所說：「倘若這本小書能夠激起各位讀者去重新思考自己對歐洲史的見解，或者是能使各位讀者重新考慮如何從歷史的觀點來思考問題，那麼這本書的目的就算達到了」我們更不難心領神會了。這本書若依該書英文名稱的字面意思來譯，應該稱作「歐洲史的形態」，由於他在書中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來取代舊有的維多利亞史觀，所以，我將它譯作「歐洲史新論」。

麥克尼爾的「新」又在何處呢？他是用「文明」由核心向周圍擴張作爲歐洲史發展的主幹，來取代原有的維多利亞史觀。而文明由核心地區向外擴散即是他的「西方的興起」一書的基本架構。麥克尼爾認爲，迄今爲止，二十世紀的歐洲仍然是一個方興未艾的文明核心，歐洲在文明的創造力上仍然保持高度的活力，還沒有像雅典、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一樣之走向衰亡。這一個論點，亦是「西方的興起」一書的主題。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看出他是有意向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書挑戰。再則，他的「文明擴散論」亦是有意與史賓格勒、湯恩比的「歷史的研究」鬭法。他不若史賓格勒、湯恩比之將世界各地的文明視作一個個孤立的文明來研究，來說明它們自身的興亡。他是將文明的發展看作是整體的發展，他認爲世界上各地的文明都有它們的相關性，這也是他在「西方的興起」一書中所要證實的。於此，我們也不難明白「新論」一書的內容了。

我個人認爲麥克尼爾提出「文明擴散論」來取代「維多利亞史觀」作爲當前美國「西洋文明史」一課的主題是適合美國情況可以諒解的。我說「可以諒解的」，是有二點理由：